

林徽因“太太的客厅”与文人往事

2025年是古建筑学家、诗人、工艺美术设计师林徽因逝世70周年。1931年至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租住在北平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后改为24号），他们的客厅被外界称为“太太的客厅”，是那个年代北平最著名的文化沙龙之一。

学界友人的精神家园

1931年10月，梁思成和林徽因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寓居于靠近东皇城根的北总布胡同3号。这是一座老北京典型的两进小四合院，整体宽敞明亮，典雅幽静。

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这样描述当年的温馨之家：“我记得，妈妈常拉着我的手，在北面的院子中踱步，院里有两棵高大的马缨花树和开白色或紫色小花的几棵丁香树”，“妈妈喜欢在客厅西北角的窗前书桌上静静地写作”，“客厅的窗户朝南，窗台不高，有中式窗棂的玻璃窗，冬天的太阳可以照射到屋里很深的地方，妈妈喜爱的窗前梅花、泥塑的小动物、沙发和墙上的字画，都沐浴在阳光中……”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客厅比其他房间要大，坐北朝南，兼作书房，布置幽雅，是他们生活、读书、会客的重要场所。北墙正中悬挂着一幅蒙娜丽莎的画像，两边是梁启超手书的魏碑体对联“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靠南窗的位置，放了一组柔软舒适的沙发，茶几上摆设一个花瓶，里面插着时令

鲜花，传递出女主人的浪漫情怀。窗框的下层已然换成玻璃，视线通透，不仅可以直视窗外的景色，隆冬时更能接纳一片温暖的阳光。窗框的顶端悬着一卷纸帘，晚上轻轻垂下，室内外顿时成为两个天地。

20世纪30年代，国内时局动荡，然而，林徽因以她的学识、智慧和富于个性的审美情趣，将自家的客厅营造成学界友人的精神家园，为她和她的朋友们创设了充满张力的文化空间。

情系一生的异国知音

1932年初，酷爱中国文化的美国青年费正清为完成自己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中美贸易关系发展史》，与女友——时任哈佛大学校长坎南博士的女儿费慰梅一起赴华游学。

这年秋，他们在北平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在北平美术俱乐部外国人举办的画展上，邂逅了同在参观展览的梁思成和林徽因。

费氏夫妇很快成了梁、林家的座上宾，尤其是费慰梅，黄昏时，喜欢一个人独自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去找林徽因喝茶聊天。费慰梅在回忆录中说：“在客厅舒适的角落里坐下，泡上两杯热茶，我们迫不及待地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讲出来。我们有时分析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就转向彼此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谈谈对方不认识的朋友。”通过梁、林，费氏夫妇还结识了执教于清

华、北大、燕大的一些知名教授，他们给这对异国夫妇提供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在那间客厅里，费正清、费慰梅不仅领略了林徽因朗诵中国古典诗词时抑扬顿挫的神韵和魅力，而且多次聆听到她品析中国古代诗歌同英国济慈、丁尼生和美国维切尔·林赛作品的异同。林徽因对这份跨国友谊同样珍视有加，她在与他们分别后写的第一封信中（1935年圣诞节之后）倾诉说：“在你们俩真正在（北总布胡同）3号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我总是觉得若有所失，缺了点什么，有一种精神上的贫乏需要营养，而你们的‘蓝色书信’充分地补足了这一点。”

随着梁思成、林徽因社交圈子的日益扩大，北总布胡同3号一度成为京派文人聚会的主要场所之一。到这里聚会的不乏北平知识界的学者、教授、作家，尽管他们专业不同，但丝毫不影响彼此在真挚友谊下的精神对话。

每次聚会，林徽因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和核心。她于文学、建筑学、艺术皆有精深造诣，其广博的知识、机智幽默的谈吐、激情四射的活力，给每一位参与者都留下了难忘印象，诚如费正清所言：“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在围绕着她转。”

萧乾眼中的林徽因

1933年9月，还是燕大学生的萧乾，经恩师沈从文之手，在其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

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蚕》，林徽因读后很是激赏，主动联系沈从文，让他请萧乾到家中做客。

11月初的星期六下午，萧乾在沈从文的带领下，羞怯地跨进北总布胡同“太太的客厅”。萧乾先前听说林徽因患有严重肺病，可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却发现她根本不像个病人。

那天，林徽因穿了一套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费慰梅去郊外骑马），对萧乾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一下子让萧乾拘谨的神态和窘促的心理烟消云散，以致半个多世纪后，萧乾对自己与林徽因首次见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她比一个健康人精力还旺盛，还健谈”，“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

1935年7月，萧乾被天津《大公报》聘用，他常造访“太太的客厅”，听取林徽因的编稿意见，并向她及其他名家约稿，不久，萧乾在文学界声名鹊起。1936年，林徽因又鼎力支持萧乾举办的活动，亲自从“文艺副刊”已刊作品中选出30篇小说，汇编为《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梁思成、林徽因愤而南迁，曾经备受关注的“太太的客厅”，成为人们绵绵的回忆。

来源：《北京晚报》

唐代四朝“财政部长”的家产

刘晏（716—780），曹州南华（今山东菏泽市东明县）人。他经历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管理财政数十年，克勤克俭，赢得“管萧之亚匹”（才干不逊于管仲与萧何）之赞，被誉为“官用足而民不困，唐以来一人而已”的著名理财家。

刘晏自幼聪颖，7岁“举神童”，8岁时正遇唐玄宗封泰山，因呈献《颂》，玄宗“奇其幼”，封太子正字。太子正字是次于校书郎的官职，掌管校勘典籍，属从九品。官职不大，对于小小年纪刘晏，历史上也少有匹敌。他的传奇故事录入后世广为流传的《三字经》：“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

“安史之乱”（755—763）持续8年，留下满目疮痍的江山，唐朝由盛而衰。宝应元年（762），大唐

风雨飘摇之际，刘晏临危受命，任户部侍郎兼京兆尹，地位相当于都城长安的市长。他发展生产，开源节流，推行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财政逐步好转。唐德宗即位后，刘晏总领全国赋税。

首先改革盐政。刘晏改变以往官家独营的模式，合理调节官营、私商与盐户的关系，实行官营为主、私商作为有益补充的制度，允许私商参与盐业经营。政府收取的盐利，原来每年只有60万缗，到大历末年增至600多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刘晏“官商分利”的盐政模式，在唐以后的封建朝代一直沿用。

其次是改革漕运。唐朝时期，长安城人口激增，有政府官员、大量军队，还有西来的番商胡贾，粮食需求非常大，关中所产不足所需，必须从江南及关东输入。长安城的漕运主要是为运粮而开，唐初

时漕运粮食每年不过20万石，到开元年间就已增加到100万石。由于多年战乱，当时水道失修，漕运废弛阻塞，沿途百姓流离失所，民力也无法支撑漕运，造成关中粮食困难，饥荒四伏。为解决长安粮食供应的“瓶颈”，刘晏果断提出疏浚河道畅通运粮的路子。广德二年（764），刘晏征用大批人力，清挖淤泥，治理河道，引汴水入淮，迅速疏浚了由江淮到高师的水路。

之前的漕运路线跨越淮水、黄河、渭水，曲折辗转，以致“停滞日多，得行日少”。刘晏先在扬州、河阴、渭口上设置存储仓库，而后将整个漕运路线划分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水四个运输段，要求严格遵守“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的规则，各行其道。漕运改革后，比过去用江南民工直运的方法提高了效率，减少了损耗，降低了运费，江淮的

粮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长安，每年运量达110万石，解决了粮荒还有所储备。

刘晏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推行常平法。常平法，相当于建立唐朝的经济情报网。他建议朝廷在各道设立巡院，各巡院负责收集辖区内的雨雪灾害、庄稼收成、物价情况等信息，按旬上报。掌握大量来自一线的数据后，他采取“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谋略，从丰处购谷物菽粟运往歉收地区，低价出售，再购买当地的土产杂物转卖丰处，调剂有无，防止谷贱伤农、水旱民散。

刘晏一生服务四位皇帝，尽职尽责，最突出的贡献是为国理财。建中元年（780），因受诬陷，刘晏被敕自尽。史书记载，抄家时仅获得书两车，米麦数石，这便是一位四朝“财政部长”的全部家产。

来源：《现代家庭报》